

时评

日前,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朱善璐在接受媒体采访中表明:北京大学在今后5年中要下决心抓文化建设,要把文化建设作为战略举措、办学之魂来抓。这样的认识在目前的中国高等教育界是有深远关怀的。

大学是什么?无论是西方大学渊源的“雅典学园”,还是中国大学源头的“太学”,在前现代社会,都是统治集团传承历史文化、培养统治精英的所在。随着现代文明的兴起,大学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在当代世界,大学的命运更是和一个国家的知识赓续、思想生产、科研创新、文化融合紧密相关。对今天的中国而言,没有世界一流、没有世界一流的大学,就不可能培养世界一流的人才队伍,就不可能涌现出一大批具有全球视野的创造型人才,在各行各业、各种社会领域,撑起一个经济发达、政治文明、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环境优美的现代化国家,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梦想就会失去重要的支撑。

但是,中国大学要承担如此重大的历史责任,除了在硬件设施、师资队伍、管理服务、合作交流等方面要不断提高质量外,还必须抓好大学的软实力——大学文化的建设。何为文化?文化是一种精神价值层面的存在和追求。文化的价值理念可以包含和渗透在建筑、环境、餐饮、服装、礼仪规制、艺术作品等各种物质存在和人本身的各种言行中。但是,并非所有的物质形态的存在必然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有的物质形态的存在,有可能变成割裂文化、折损文化的糟粕,甚至有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一种背离人性、违反人伦的毒瘤。

大学,由于其在文化资源上的占有优势,最容易和人类历史文化传统相衔接;由于其承担了人才培养的任务,其活动主体必须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由于其承担时代责任的需要,必须能批判性地将融合历史和现实的各种文化资源,进行新思想和新文化的创造,从而引领时代风尚,推动人类文明的不断提升。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来说,大学更要承担起为人类创造新的更高级文明提供思想和精神动力的重大责任。自觉的文化自觉是中华民族文化自觉的重要组成部分。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后,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中国大学在物质条件上的改善日新月异,但人才培养的质量和发展的要求相比,却还存在很大差距,在许多方面,尤其是创新能力、人文素养和道德水平等方面,还备受媒体和社会诟病。这些问题的出现有诸多客观原因,但是大学管理者对大学文化在情感上的疏离,在认识上的淡漠、在实践中的懈怠,则是不可不正视的主观因素。

必须承认,在当代社会推动大学文化建设,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是复杂多样的,比如,市场功利主义的侵入、多元价值观的冲击、大规模扩招的挑战、中国大学管理机制的滞后等等,但是,我们也不无遗憾地看到,一些中国大学在面临多重压力下,缺乏明确的价值定位,更没有建立一套成熟的立足于实现自己价值目标的规章、制度,尤其是没有通过有效的物质载体为这些价值理念的练习和修行,营造必需的现实环境,提供必要的资源支撑。“树欲静而风不止”,其结果,就是一部分本应该文明基石、文化殿堂的大学,弥漫着官僚气、市侩气、媚俗气、萎靡气,成为提供

“负能量”的场所,让学生灰心、家长忧心、社会担心。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北大、清华、南开、西南联大等部曾经在山河破碎、血雨腥风、世风败坏、人心离散的情况下,以博大的家国情怀、深沉的责任担当、丰富的人文意蕴、磅礴的青春勇气、韧性的事业追求,诠释了中国乃至世界高等教育史上辉煌灿烂的篇章,他们的精神和事业深深地融入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成为中国人用之不竭的思想财富和精神资源。面对这些活生生的历史真实,即使我们有种种困难和挑战,也应该无畏地选择面对,勇敢地选择担当。

归去来兮,大学之魂!

呼唤更加自觉的校园文化

汾灵

墨子科技思想中的人文关怀

邵长杰

诸子百家争鸣的先秦时期,是我国古代早期学术繁荣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儒、道、法等诸家均视科学技术为末道或不屑为之或明确排斥。儒家经典论著《论语》中讲道:“虽小道,必有可观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所以认为君子当致力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视科学技术为“小道”而不为。道家崇尚自然,主张小国寡民,安贫乐道,对科学技术持有抵触态度,老子在《道德经》中讲道:“智慧出,有大伪”,“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技)术,奇物滋起。”认为只有“绝圣弃智”“绝巧弃利”才能保持原有的自然本色。法家基于“定分止争”“兴功惧暴”的要求,看到了科技对于富民强国的重要性,但法家却不推崇科学技术。

在这一时期,唯独墨家对科学技术表现出一与众不同的价值取向。墨子在政治上提出“兼相爱、交相利”主张的同时,还在几何、力学、光学等自然科学领域及军事技术、机械、土木工程诸方面取得伟大成就。梁启超在《〈墨经校释〉自序》中说:“在吾国古籍中欲求与今世所谓科学精神相契者,《墨经》而已。”钱临照更赞叹:“集数百条自然现象与思想之定义与定律于一书,先秦诸子之著述中惟此墨经而已矣;求诸世界并世之古籍中,亦惟古希腊之少数著述始足以相埒,吁,亦盛矣!”并言称墨子是“我国古代稀有之科学家也”。随着近30年来墨学这一“千年绝学的伟大复兴”,以《墨经》为代表的墨家科技成就获得了学术界普遍认可和推崇,墨子也被尊称为“科圣”。当代著名墨学专家杨向奎先生认为:“一部《墨经》无论在自然科学哪一方面,都超过整个希腊,至少等于整个希腊。”笔者认为,墨子的科技成就固然让人骄傲,但是其在科技实践活动中贯彻始终的“人文关怀”更值得珍视,对当今科技发展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

一、“义利统一”——墨子科技思想的功利主义

所谓科技功利主义是以墨子

的义利观为理论基础,也就是何谓至善的问题。孔子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把义利对立起来,主张“仁者安仁”“何必曰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放于利而行,多怨”。墨子回答这个问题时主张合一的观点:既肯定“利人”为至善的规范,维护了道德原则的尊严;又把“义”看成是达到“利人”“利天下”的手段。

墨子提出“万事莫贵于义。”(《墨子·贵义》)。他认为:“义者,正也。何以知义之为正也?天下有义则治,无义则乱。我以知义之为正也。”(《墨子·天志下》)故“义”是“正”。在《墨子·天志下》中墨子又说:“义,利也。”(《墨子·经说上》)即“义”是“利”,主张“义”以“利”为内容。在墨子看来,“利”是判断衡量事物是否符合“义”的价值判断尺度,“凡言凡动,利于天鬼百姓者为之;凡言凡动,害于天鬼百姓者舍之。”(《墨子·贵义》)。他明确提出“凡费财加力,不加利者不为也”(《墨子·辞过》)。《经说》篇中有道:“功,利民也”,就是说只有有利于人民的事情才有“功”可言。他还说:“所谓贵良宝者,为其可以利人也。而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六异,不可以利人,是非天下之良宝也。今用人为政于国家,人民必众,刑政必治,社稷必安,所为贵良宝者,可以利人也。而义以利民,故曰:义,天下之良宝也。”(《墨子·耕柱》)也就是说,墨子以利人、利民为义,认为义与利是合一的,“义”是“天下之良宝”。

墨子认为,凡是符合于“利天下”“利人”的行为,就是“义”;而“亏人自利”“害天下”的行为就是“不义”。一切善恶之名的区别也都以是否有利为标准。有利于天人的现实利益的,就是至善的标准;反之,凡是有害于人的,就是恶。为了实现行“义”的目的而得到“利”,墨子是愿意付出代价的。他在《大取》篇中说:“断指与断腕,利天下者,无择也。死生利若一,无择也。”通过这一段话我们可以体会到墨子那种只要对天下人有利,无论断指还是断腕,是生还是死,都会义无反顾、一往

无前的博大情怀。在这样的“义利统一”思想的推动下,在“行义重利”的人文关怀大旗的指引下,墨子及其弟子的科学技术实践都是努力地趋向实现“义”“利”等功利性目标,最终实现“刑政政治,万民和,国家富,财用足,百姓皆得暖衣饱食,便宁无忧”(《墨子·天志中》)的大同社会理想。墨子的科学发明和创造,只不过是他的“义利统一”思想在科学技术领域的投射和外化。

在这里笔者想指出墨子所讲的“利”,乃立功之利,当然也包括“忠”“惠”“孝”“慈”等道德规范,而不是世俗所慕财货之利,简单地讲:墨子之利是公利而非私利,不是损人利己之利。墨子眼中只有“人民之大利”“天下之利”“国家之利”。

二、“道技合一”——墨子科技思想的价值旨归

《墨子·鲁问》记载:“公输子削竹木以为鸢,成而飞之,三日不下,公输子自以为为巧,子墨子曰:公输子曰:子之为鸢也,不如匠之事情才有“功”可言。他还说:“所谓贵良宝者,为其可以利人也。而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六异,不可以利人,是非天下之良宝也。今用人为政于国家,人民必众,刑政必治,社稷必安,所为贵良宝者,可以利人也。而义以利民,故曰:义,天下之良宝也。”(《墨子·耕柱》)也就是说,墨子以利人、利民为义,认为义与利是合一的,“义”是“天下之良宝”。

《韩非子·外储说左下》记载:“墨子为木鸢三年而成,蜚一日而败。弟子曰:先生之巧不能使木鸢飞。墨子曰:不如为车辖之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费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远力多,久于岁数。今我为鸢,三年成,蜚一日而败。惠子闻之曰:墨子大巧,巧为鞬,拙为鸢。”

从上述两段记载中可以看出,在墨子的科技实践中寄托了强烈的人文情怀,墨子的科技思想是一种人文化的科学观,里面包含着丰富的人文关怀和人文主义精神。由于墨子的科学技术实践都是为“救世”为特征的“义”的思想服务的,所以“道”和“技”就构成了墨家科技思想的主要元素,以“道”保障“技”的发展方向,以“技”促进“道”的深入发展。两者相互依存、相互支持、相互制约。

针对墨家学派这一特点,朱亚宗先生认为:“墨家集团成功地

实现了人类社会早期难以具备的两个结合,一是学者与工匠的结合,二是辩论与技术的结合。这大致可以看作是墨家学派的特点。”所谓“学者与工匠的结合,其奥秘在于学者在空闲的读书与思索中发展起来的想象力与理解力用于提炼工匠积累的技术经验,由此而创造出新的科学知识。在这种结合中,学者的有闲与工匠的实践都是缺一不可的条件”。而“这两方面的条件恰好在墨家学者身上得到了完美的结合”。因此,“墨家集团是实现学者与工匠相结合的理想组织”。

墨子既是伟大的思想家,又是伟大的科学家的双重身份,是他的智慧体系中两个互相交融的关系最为密切,与人民群众生活最为密切,无论是发展几何学用于建筑和手工业制作,还是研制杆杠、滑轮、桔槔等使用广泛的生产工具,目的都是为了能提高劳动效率,增加社会财富,以获取实利。墨子说:“其为舟车何以通四方之利。凡为舟车之道,加轻以利者鲜且不加者去之。”(《墨子·节用上》)意思是造车船用来沟通四方之利,造车船的原则是能沟通过快便利的,就增益它,不能增加的,就去掉。这句话最能说明墨子创造价值的标准。张岱元先生认为:“墨家自然科学研究从属于墨子的‘为天兴利除害’的最高宗旨。”这一论断深刻阐明了墨子科技思想的真谛。

目前所有问题概括起来,不外乎一个问题,那就是在科技实践过程中“道”与“技”的疏远和分离,“道”日渐萎缩,“技”在没有“道”的保障之下自我加速式地膨胀,那种相辅相成的关系越来越失去了平衡。这种人文关怀方面是侏儒、技术方面是巨人的科学技术,与墨子所提倡的“道技合一”的科学技术相差甚远,前一种科学技术完全违背了科学技术发展所应遵循的伦理原则,一定会把人类社会引向自身发展目标

的反面。

三、警惕科技发展中的人文代价

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在

爱国忧民,应是不可或缺的主题

——纪念伟大诗人杜甫诞辰1300周年研讨会综述

本报记者 高 昌

11月28日,由中华诗词学会、中国诗歌学会和中华诗词研究院联合举办的纪念伟大诗人杜甫诞辰1300周年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李瑛、刘征、郑伯农、张同吾、李文朝、周兴俊、周清印、张桃洲、薛天纬、周笃文、蔡世平、霍俊明、王玉明、高立元、赵仁珪、钱志熙、李小雨、张桂兴等著名诗人、学者60余人参加了研讨活动。

中华诗词学会会长郑欣森委托诗人王改正宣读了他为研讨会所作诗歌精神。郑欣森认为,杜甫不仅是一位生活于8世纪中国诗歌巅峰上的巨人,而且是中国“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艺术光彩”。探讨他的诗歌成就与人生经历,加深对其艺术追求与人格践履的认识,继承他的精神遗产,这对于我们今天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推动中华诗词事业的发展,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

刘征、周笃文、张桃洲、薛天纬、蔡世平、霍俊明等先后发言,从不同视角、不同侧面阐述了杜甫诗歌精神,特别是他爱国忧民的现实主义思想。与会者认为,杜甫始终以人生与社会为关注的对象,把安邦济世视为自己的使命,采取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具有强烈的使命意识。他虽然有种种的不幸和委屈,有过内心的矛盾和冲突,但没有沉沦,也没有做遁世的隐者。他的可贵之处,在于超越了儒家的传统信条,即不管穷达与否,都要兼济天下;不管是否在位,都要谋政、议政。杜甫是一位伟大的仁者,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人格理想的楷模,在

他的身上,凝聚和发扬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精神,具有历史和现实的意义。他既反对南朝诗歌的浮靡风气,又高度评价其在丽辞和声律方面的艺术成就。杜甫诗歌创作取得伟大成就,与他的兼收并蓄、转益多师的态度有重要关系的。他的创作千锤百炼,精益求精,使其诗歌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他是古典诗歌语言艺术的大师,既重视继承、吸收前代书面语言,也注意民间口语的运用。杜甫在“炼字”“炼句”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自铸伟辞,使语言更为精妙,使诗意更为精警。他在诗歌的意象经营与章法布局上也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取得了惊人的造诣。

与会者表示,弘扬杜甫诗歌精神,就是要像杜甫那样热爱祖国、关注民生,最根本的就是要适应时代发展,直面时代主题,特别是传统诗词要注意强化时代精神。中华诗词学会常务副会长李文朝说,时代题材涉及时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何选取时代题材,是每个诗人的创作自由,但爱国忧民,应是不可或缺的主题。愿我们弘扬杜甫的诗歌精神,热爱祖国,关注人民,创作出无愧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

“今夜,我的心/上溯到一千三百年前的上游/湘江,可记得苍烟紫锁的一棹孤舟……”著名诗人李瑛为纪念杜甫诞辰1300周年而创作的这首《湘水悲歌》,经朗诵艺术家朗诵,打动了研讨会现场许多人的心。由青年博士用昆曲演唱的《登高》等杜甫名篇,也博得阵阵热烈的掌声。

1840年之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失去以往作为天下中心和文明典范的自我定位。落后挨打的耻辱,救亡图强的压力,迫使几代中国知识精英不断进行自我反思和批判,其激进思路从技(器物与技术)不如人到制(政治制度)不如人,深入到教(文化与价值体系)不如人,极言之,“百事不如人”(胡适语)。中国人对于自身的历史、社会与文化,丧失了基本的认知,也一步步丧失自我表达的能力,难以恰当地有力地表述自己的存在与需要。

100多年来,中国知识精英在迷茫与曲折中不懈谋求民族自强之道,努力探索新的文化表达系统。这使得中国现代性的构筑面临多重历史任务,要求知识精英具有文化上的自觉,不仅面向全球与未来,还应在当下现实与历史文化传统之间建立精神联系,从而恢复完整的自我认知,培养强劲的自我整合能力,在新的视域和处境中更新和弘扬文化自性。

文化自性

本文借用“自性”这一佛教概念,把文化自性视为在彼此联系和互动变化之中相对独立而又各具个性的文化基因和本质规定性。每种生物都有自己独特的基因遗传密码,并以此为前提而汇聚、聚合各种因素,形成各自的体质和样态。任何一种文化也都有其文化自性,并以此为基础而汇聚、化合各种因素,形成各自的文化面貌和特色。文化自性在历史的长期发展中由某些核心价值逐步积淀起来,成为具有基因性质的存在,是文化传统得以自我形塑的具有内在规定性的价值内核,也是该文化传统在长期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仍然能够是其所是的根性所在。

每一生活与价值共同体的文

化自性,都由一代代生命历史性地传递、绵延,并在群体性的相互学习与启发中丰富起来、扩展开来。代际传承与群体互动,是文化自性从生活与价值共同体中萌生并得到发展的壮大的基本条件。文化自性贯穿于不同时代而保持相对的自主性和稳定性,各种损益与转化都在其自主调控下进行。每一次内部裂变和整合,每一次内外交通与激发,都会尽量被纳入到文化基因的自我延伸、拓展的内在生长逻辑之中,创造性地实现更高层次上的自我重塑。

文化的自我守护和适时调整,两个方面互为支援,对于自身

根性的培固与充养,同时就意味着主动地融摄外来因素,以壮大自身的扩展和涵盖的能力。假若外来影响足够强大,植入的因素重要和繁多到无法加以主动融摄的地步,就有可能使自主能力受到削弱和压制,从而使文化自性和产生歧变。这种变异如果足以改变价值系统的既有序列和稳定性结构,文化自性就会发生根本性质上的改变,乃至丧失在原有基础之上维系自身和作出选择的主动权。文化的基因性歧变,将使该文化失去成为自己的根据,或是消融于更为强大的文化之中而化为其有机成分,或是由于没有了承载者而完全从历史上消失。只有足够强大的文化和文明体,才能得到较长时期内一直能够通过吸纳和消化各种社会历史因素来不断肯定和强化自身,以确保文化自性的稳定性和扩展性,维系超稳定的文化生命结构。

多元生态与文化自觉

在整个生物圈内,各种生物大类和每一生物个体都在不同层次上各具遗传特性,人类各个民族、家族乃至个体也都从各个层面上有着自己相对独立和稳定的性格和特色。类似地,每一种文化也以其独特和鲜明的自性而丰富着整个文化生态圈,使之呈现出复杂多样的面貌。多样,才能保证强劲持久的生命力;单一,则预示着后继之忧,有衰微乃至灭绝的危险。置身于多种文化的共存之中,每种文化独一无二的自性,都值得为这种文化所“化”(养育、

教化)之人去珍视和守护,这是文化自我的记忆延续和生命扩展的需要。对于每一种与众不同的文化自性的保存,又都是在维护人类文明圈元的多元生态和良性循环。生物多样性是生物圈健康演进的表现,民族特色、文化形态和个体偏好的多样性,也是人类社会文化健康演进的表征。生物世界的法则则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为着生存繁衍的根本需要,生物依据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和物种互动关系,积极进化出各种各样的生命形态,形成既竞争又互补、既对立又统一的生命巨链。人类社会、文化生态具有类似的竞争性及依存性关系,但其优化状态却表现为“和而不同”,在和谐共生的场域中使自身特性得到尽可能充分的发挥,而贡献于整个人类社会文化的存在巨流。

置身于全球化浪潮之中,面临着人类共同的文化大转型,不同的文化怎样在确立文化自主地

位的基础之上,多元共存、平等交流,形成一个和谐共融的世界,这是费孝通晚年思考的大问题。“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各文化需要通过自我认识与理解来实现自我肯定,文化间关系则强调相互肯定、彼此尊重,平等交流、真诚相待,并对“和而不同”的人类文明和谐前景抱有深切期望。

自我认知和自我确立是文化自觉的重要方面,其实质正是对文化自性的自觉。自性作为文化基因确有其相对稳定性,但不能离开人的文化自觉对它进行记忆串连与阐释融合的再赋义、再强化和

再生成。文化自觉就是对于由文化基因所引导的文明历程的自觉意识和自主记忆,尤其体现为这种反复地自我提示和自我确认的过程。自性与自觉之间,是一种彼此塑造和焊接的关系:强劲的自性,必将拥有高度的自觉意识与行为;自觉地自我认识和自我确立,又将在新的意义上使自性的一以贯之的统一性得到维护和壮大。

当今中国在理论上面临的任务,就是要拿出一套以中国人生存经验与中国文化自性为基础的,能够说明在这片土地之上的民族生活——文化共同体之自我定位的整体性论述,它包括历史叙事,现实应对与未来构想。这就要求在全球视域与人类共存的前提下,对于中华民族历史生命的延续和文化生命的壮大,必须有高度的自觉。

文化重构与文化自信

中国文化曾长期拥有一套相

对完整的论述,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天道的关系,都得到合理的解释,中国人的族群身份、文化认同也得到有效的安置。近代以来,中国人逐步丧失与自身历史传统的意义联系,某些人的文化心理之自卑甚至到了寄望改种的地步。

但中国是文明大国,有着巨大的文明规模、深厚的历史记忆和强劲的生命修复能力。170年来,中国从文明体转化为民族国家,在现代实践中探索中国传统现代转型,力图走出一条现代文明的中国道路。摆在现代中国面前的任务,既要继续推进和深化启蒙,同时也要从失忆和无根状态中找回文化自我、弘扬文化自性,进而在全球化体系中对人类命运给出中国的回答。因此必须立足于变化着的社会条件和时代境遇,通过自我更新来摸索那一以贯之的历史演进之道。在此意义上,中国文化传统最根本的自性,就是“生”“和”与“度”,具体说来就是贵生厚德、讲信修睦、政通人和、中道而行。文化重构当以生为本、以和谐为理想,以中道为尺度,健行不息、日新不已,在全球视域中追求普遍性的提升与包容性的扩展。

距今近百年前,梁启超游历欧洲回国,写下了《欧游心影录》,其最后一节以“中国人对于世界文明之大责任”为题写道:

“我们因此反省自己从前的缺点,振奋自己往后的精神,循着这条大路把国家挽救建设起来,决非难事。我们的责任这样就算尽了吗?我以为还不止此。人生最大的目的,是要向人类全体有所贡献。……我们人数居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我们对于人类全体的幸福,该负四分之一的责任。不尽这责任,就是对不起祖宗,对不起同时的人类,更是对不起自己。”